

德国文化
评论丛书

时代的精神忧患

——德语文学评论集

叶 隼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时代的精神忧患

——德语文学评论集

叶 隽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代的精神忧患：德语文学评论集 / 叶隽著.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德国文化评论丛书)

ISBN 978-7-301-16226-2

I. 时… II. 叶… III. 文学评论—德国—文集 IV. I516.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3396 号

书 名：时代精神的忧患——德语文学评论集

著作责任者：叶隽 著

责 任 编 辑：陈甜

封 面 设 计：奇文云海

排 版 设 计：北京河上图文设计工作室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226-2/G · 2742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开 本：650mm × 980mm 16 开本 9.75 印张 121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 录

第一辑 席勒别解 /1

席勒的魏玛之路与“古典图镜”之形成

——以“中道思维”为核心 /2

少年雕裘曾轻狂

——席勒爱情的另类解读 /21

风仪贵兮，美人绰约

——席勒戏剧中的女性 /28

死后方生，吞吐宇宙

——席勒戏剧中的英雄 /36

创造的冷静与伟大的耐心

——简论席勒“艺术创造”思想的当代意义 /48

第二辑 诺奖意义 /57

20 世纪德国文学史视野中的“诺奖意义” /58

“指鹿为马”与“伪证送獭”

——再读《獭皮》 /67

时代的精神危机

——重读《荒原狼》 /71

此情可待寻惘然

——重读《列车正点到达》/77

“时代痛症”与“昨日重来”

——《蟹行》的忧患意识与形成中的时代精神/81

第三辑 文学札记/87

德国文化传统视野中的“反法西斯文学”/88

彼得斯与《夜幕》中艺术家镜像的意味/94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学者创作与《尘世的爱神》的意大利情结/99

女性视角之局限抑或新人创作之瓶颈？

——读《珍奇的物质》/104

第四辑 耶利内克/109

奥国文学研究的命题与意义

——从耶利内克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110

凤舞红尘后，此情可待否？

——读《追逐爱的女人》/121

文章悲白发，奥国“恶之花”？

——《女钢琴师》批评/130

耶利内克三问/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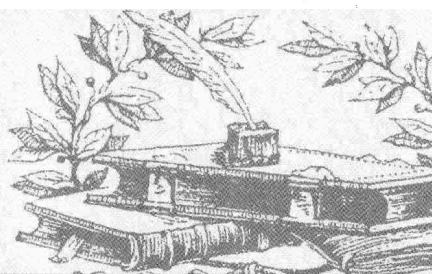
“性的原罪”还是“爱的遁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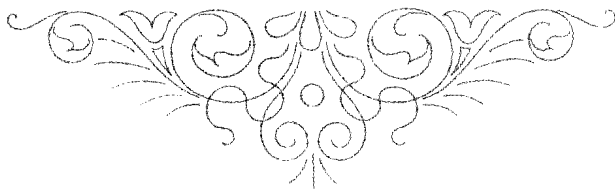
——耶利内克作品研讨会综述/141

后 记/149

席勒別解

第一輯





席勒的魏玛之路与“古典图镜”之形成^① ——以“中道思维”为核心

就德国思想史的发展来说，端绪众多，颇难清理。自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降，犹以启蒙运动之兴起为巨。不过，我想别出心裁，将启蒙以来的德国思想发展以三大路径归纳之，即“启蒙理性”（Vernunft der Aufklärung）、“浪漫情径”（Einfühlung der Romantik）与“古典图镜”（Spiegel der Klassik）。^②

在我看来，前两者基本可以涵盖德国思想史的二元对立模式。但问题在于，“浪漫情径”并未能取代“启蒙理性”而成为一种压倒性的主流思想。即便日后非理性的思潮和巨人辈出，但理性思想仍基本占据社会发展潮流的主脉，最多也就是说成“双峰并峙”（关于这一问题，作者将另文撰述——《“启蒙理性”与

① 原载《文景》2007年第2期，原名“‘古典图镜’：席勒、歌德的魏玛岁月”。

② 此处德文为笔者自己杜撰。



席勒照片之一

“浪漫情径”：思想史路径的两分法》)。但我想在此大书一笔的，则是所谓“古典图镜”。其中心人物是歌德、席勒，往上可以追溯到莱辛、温克尔曼等人，他们追崇古典，推举希腊，虽然不过是“镜花水月”，但却凸显了那代知识人“精神突围”的自觉意识，难能可贵。这代人，生长在启蒙理性的大潮之中，康德所谓“启蒙运动”是他们的大背景，所以理性概念从根本上深入人心；在具体行为表现上，最初却恰恰是以反理性的方式出现，“狂飙突进”明显是针对理性统治地位的运动，张扬感性、推崇情感、追逐个体之自由精神（但其中仍不难寻出理性的踪影，如席勒的《强盗》设计）。然而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歌德、席勒，很快就撤出了，并最终表现为承继传统的“古典图镜”，最典型的代表自然是歌德、席勒的魏玛时代。魏玛的十年合作，其实所尝试的正是“启蒙理性”与“浪漫情径”的调和之路，既不可一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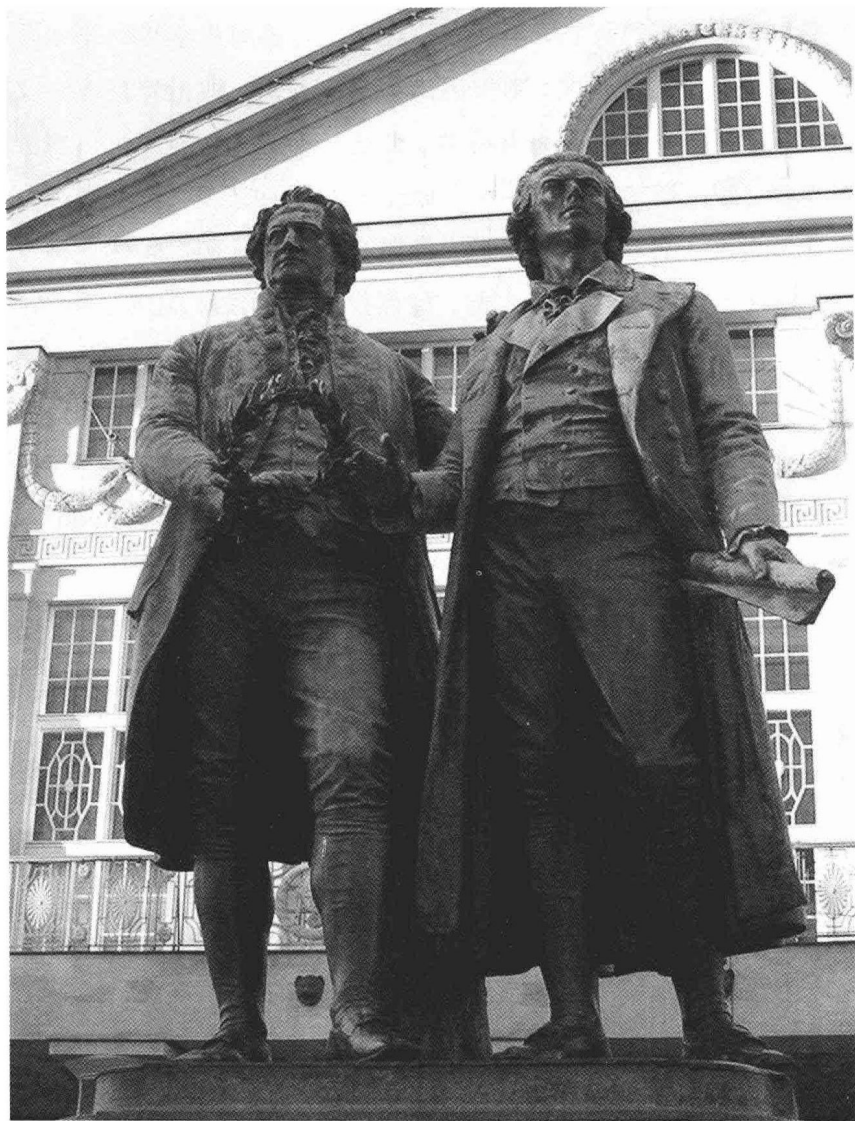
席勒照片之二

张扬自我的个体意志，又不能过分克制自我而强调理性的力量，那么或许回到自然本性的古代希腊，是可能解决问题的方式，这就是我这里要谈到的“古典图镜”。

有意思的是，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则到了19世纪后期，其发展情况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古典图镜”固然是如“水打梨花”，无人追随仿效，似乎自歌德去后，如黄钟废鸣，自此绝矣（但这一线索到20世纪的黑塞、茨威格等，似又有接续的可能，显得要温柔敦厚一些，多少有些调和的倾向）；而“启蒙理性”居然也“分道扬镳”，距离康德等人奠立的基本原则渐行渐远，终致“南辕北辙”，马克思居然发展出一套阶级斗争的洋洋学说，不但在理论上蔚为大观，在实践中也所向披靡。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等人发展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难复马克思当年之原貌，但毕竟其根源在此；而青年黑格尔派试图以“黑格尔

思想”一统天下的想法，虽然荒谬，却曾在德国哲学界与学术界颇行其道。在文学领域，则发展出另一条路向，即批判现实主义的兴起。其中翘楚，自为冯塔纳、曼氏兄弟等人；当然也可将豪普特曼、西格斯等人纳入。而大放光芒的居然还是“浪漫情径”，这条最讲究人性、最注重情感、最关心个体的思路，居然最得人心，先是有叔本华之异军突起，猛然挑战占据主流的老黑格尔；之后，尼采更将“悲观意志”发展到“强力意志”，并以其生命之壮烈悲慨而为之做了最好的注脚。这一线索延伸到20世纪，则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本恩、里尔克等人的耀眼光芒，还可提及的，诸如卡夫卡、穆齐尔、霍夫曼斯塔尔等，亦莫不受到尼采之影响。

历史的原相当然会比这里提及的线索复杂得多，这里只是姑且如此简单化而已。遗憾的是，前两者多有发挥变异，作为集大成者的“古典图镜”的重要性，却似乎少有人自觉意识并担当承继。验之以现代中国的思想进路，似乎也若合符节。虽然思潮众多，热血沸腾，但细细区分，现代中国的“众声喧哗”，也无非以“启蒙理性”与“浪漫情径”二道为主。康梁改革，中山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多少因了近代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救亡图存”之现实困境，“启蒙理性”之占据主流地位，当然也就不难理解。而讲求个体自由、感性发挥的道路，也不是无人尝试，如无政府主义就曾有过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如蔡元培、熊十力等人无不曾摆弄“火药大炮”，参与过这条浪漫情径）。可唯有“古典图镜”一路，似乎竟无人试之。“复古主义”的标签自然是被贴得太多，动辄就给人冠之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名头，确实也让人思之胆颤心惊，不敢胡乱发言。但尝试“中体西用”者却并不在少数，何以并没有真的能发挥重大功用？我看，恐怕还是需要从



魏玛的席勒歌德像

贤自身的思想行动上去找原因。歌德、席勒在魏玛十年的成功，是脚踏实地做出的成绩。

这一点，不妨从席勒的“通向魏玛之路”谈起。1789年，席勒来到耶拿大学执教，虽然是因了歌德的推荐，但两者的交好并

不从此时起。两年之前，他曾来过魏玛，其时歌德尚在意大利旅行，在与维兰德和赫尔德的接触中，他感觉并不太好，虽然彼此之间还算客气和谈得来，但并未生发出何等高致。然而，席勒居耶拿，毕竟与魏玛相近，这两座德国古典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城市，为形成德国的“古典时代”贡献卓著，值得特别提及。^①席勒与歌德的接近，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这种地理上的便利条件，1794年，歌德与席勒在一次偶然的聚会活动后略加攀谈，发觉了彼此之间的吸引力。要知道，虽然两人居处近在咫尺，但不相往来（指无深交）却达六年之久；可话说回来，若无地理接近的“近水楼台”，二者也未必能寻到这“金风玉露”恰相逢的大好时刻。

应该说，此时二者的“思想彗星撞击”既有其偶然性，亦有其必然性。所谓必然，乃是说时势背景与个体探索在前期都已准备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正是“对话”与“共思”（think together）。但这又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作为对手（Gegner）或伙伴（Partner）的，必须要有合适的人选，这样才能彼此成为“激活思想的马刺”，甚至是“文艺创造的精灵”。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知识精英的刺激是很大的，但或许正是异邦的镜子照亮了本国的前途，歌德、席勒，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态度都无一例外地从开始的好感到后来的反对，其根本思路则一：拒绝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演进。但如果不是革命，那么需要追问的必然是：路将安出？

18世纪末期的德国，其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一点都不优于法国。虽然知识精英试图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想仍如火如荼，但究其可以踏实着手处，其实极为不易。歌德在经历了青年时代的狂

^① 参见Wentzlaff-Eggebert, Friedrich-Wilhelm, *Schillers Weg zu Goethe* (《席勒向歌德之路》),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63.

飙突进之后，又有了魏玛行政的实践经验，对政治与社会体验更为深刻。虽然有论者将18世纪后期的魏玛公国誉为“魏玛盛世”——这当然也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反映了真实，但也有论者认为这是“美化封建德国的鄙陋状况”^①。总体而言，虽然，在德意志的历史版图里，魏玛公国实在不值一提，确实，面积狭小（34平方英里）、人口稀少（约10万），在德意志诸邦中确实微不足道。但由于公爵卡尔·奥古斯特（Karl August）其人，此邦却在德国文化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说一句“英才毕至”当不过分。虽然，距离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从本质上，公爵也不可能改变其王公统治者的根本立场。歌德的弃高位而秘密游历意大利，其实正是对现实政治失望之后，转向精神追索的重要转折。席勒亦然，虽然与歌德优裕从容的生活状态无法相比，但他由自己与封建王公的对抗而开始颠沛流离、苦难折磨的物质生活，同样对这个严峻的现实状态有深刻的思考，这也就难怪，他对人身自由与物质自由的诉求无比强烈。有意思的是，在同样经历了选择“以笔为旗”的狂飙时代之后，席勒亦不约而同地搁笔了，他转向哲学，亲近康德；进入历史，执教耶拿；甚至“独创新见”，将美育思想发扬光大，形成了颇为丰满完整的一套理论。

就是在这个时候，两者相遇了。此前，歌德虽然曾经推荐席勒，但以他其时在德国文化场域中的地位，不太可能对一般人“特别高看”；席勒比歌德年轻十岁，但作为《强盗》的作者，即便年轻时曾接受过歌德的检阅，也不会轻易地匍匐在地。这些精神奥林匹斯山上的巨人，必须是通过“精神的碰撞”来相互认知与推崇的。有意思的是，二者的这次“伟大的握手”，竟然是在耶拿的

① 参见《弗朗茨·梅林和他的文学批评》，载〔德〕弗·梅林：《梅林论文学》第8页，张玉书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一次自然科学研究聚会上，歌德对颜色学的研究和人类头盖骨的发明自然不必赘言，而席勒的兴趣由此可见亦同样广博。正是在这样的“博杂的共同探索兴趣”之下，才可能有未来的辉煌合作。

恩格斯有一段对歌德与席勒的比较：“歌德过于全能，他的性格过于积极，而且过于入世，不像席勒似的逃向康德的理想中去躲避鄙陋；他过于目光敏锐，不能不看到这个逃避归根结蒂不过是以超越的鄙陋代替平凡的鄙陋而已。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整个精神倾向都使他面对着实际生活……”此言可备一说，但过于强调两者的差异，对席勒未免过于贬低。其实，无论是歌德还是席勒，选择的路径不同，但试图解决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的理想却是一致的。否则以二者如此不同的性格特点，又如何能有如此亲密的灵魂接触与相互阐发创造？歌德的入世，因为他有在魏玛从政的可能；席勒的出世，因为他的出身与经历决定了他很难为当权者所接纳。但是否就因此可判断席勒是出世的呢？我看宜慎重，席勒其实是一个非常入世的文化人，看看他做的办刊努力就可以知道了。早在1794年6月13日，耶拿见面尚未发生，席勒就曾致信歌德，请他参与《季节女神》（*Die Horen*）的编辑工作。这份月刊的参加者人数相当不少，仅在《发刊词》中公布者就有约二十人，其核心人物包括歌德、费希特、洪堡、克尔纳与沃尔特曼。出版者则为科塔。而此外列名的，也有相当不少的重要人物，包括赫尔德、雅各比、施莱格尔等人。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各人名字前所冠以的头衔，就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与此刊闭口不谈政治的编辑宗旨相比，竟会有相当部分人物是政界头衔，如“魏玛的枢密顾问”歌德、“耶拿的枢密官”席勒、“柏林的公使馆参赞”洪堡等等。

虽然这一刊物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三年，但它在德

国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地位，却一点也小视不得。如此立论，并非仅因为他的主事者是席勒这样的重要人物，也不仅是因为席勒与歌德携手合作的伟大友谊不妨以此为引线，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公共思想平台所吸引的德国古典时代最优秀的精神人物，以及作为编者的席勒自家背后的“办刊情怀与思路”。可不是吗？席勒作《发刊词》，开宗明义即强调：“在一个逼近的战争喧嚣使祖国焦虑不安的时期，在一个政治意见和这场战争的利益几乎在每个社团中再次引起争论，而诗神和美惠三女神因此被太频繁地吓跑的时期，在一个无论在日常交谈中还是在日常论著中都面临着国家批判这个不可拯救的追命恶魔的时期，想把那四分五裂的读者邀请来进行方式完全对立的谈论，既是值得赞赏的，也是冒风险的。事实上，时代形势很少允许一本杂志获得成功，杂志只得对日常引人注目的主题严守沉默，而它的荣誉则将在于通过某种不同的东西来使人满意，就像现在通过任何东西来使人满意一样。但是，当代狭隘的利益越是使人心情紧张，越是约束人和压迫人，需要越是通过对那种纯粹的人的东西和超越时代任何权威的东西的更高的普遍兴趣而高扬起来，它就会重新处在自由之中，而且使政治上分裂的世界重新在真和美的旗帜下联合起来。”^①这样的席勒，你能说他是完全出世的吗？他是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的吗？

席勒、歌德的订交虽在耶拿，但古典时代的大事业却在魏玛。席勒之前往魏玛，正是出于歌德的吸引力。歌德曾坦白无误地宣称：“我有了席勒，对我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幸福。虽然我们性格不同，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相同，这使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关

① 席勒：《〈季节女神〉发刊词》，载〔德〕弗里德里希·席勒：《秀美与尊严——席勒艺术和美学文集》第228-229页，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歌德画像

系，实际上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离开了对方都无法生活。”^①席勒当然亦同此心，不过这一认识乃是事后追认。在当时，他们恐怕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样的合作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但也正是这种无意识才有可能“欲穷远目，更上高楼”。应该说，从今天的立场去理解当年的思路，会有很大的不同，毕竟时代、背景、语境等等，都会有相当之差异；更何况，是以异族后辈的身

① 转自〔苏〕洛津斯卡娅：《席勒》第212页，史瑞祥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份，去理解前贤。但在我看来，对于德国知识精英来说，自启蒙以来，就一直面临着一个自我身份认同与民族构建的问题，这条线索，一以继之，但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在方法与手段上，却有不同的探索与相当之歧异。代际承传、师生反目、诤友断袍……这种种发生在知识精英中的现象，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所争在大者，关系到德意志民族本身的精神确立。托马修斯作为“德国哲学”的奠立者，花了大量精力，试图使哲学从神学中摆脱出来；莱布尼茨作为开启德国启蒙大幕的旗手，奠定了理性原则的德国规训；而其弟子沃尔夫则竭力使之发扬光大；到了莱辛与康德，一以文学，一以哲学，都坚持的是启蒙的原则；可康德与哈曼，本为柯尼斯堡的同事与朋友，却渐行渐远，分别代表了理性与浪漫的两极，原本坚信启蒙的哈曼，竟又从意大利接过维柯的思想源流，高张反理性的大旗；而这思想上的激烈碰撞，竟又发生在初为康门弟子后改投哈氏的赫尔德身上，最终竟以赫尔德挑战前师康德的面目出现；可赫尔德又是歌德的青年导师，对其影响重大，狂飙突进不妨正可看做“康梁师徒”的戊戌变法，只不过策略不同而已。从这样的思想史源流与框架中来看，歌德日后之“省思自我”，是理所当然。梁任公自立门户，并未决然地走向反面——投向孙中山。同样，歌德在走出浪漫的时候，也未想当然地选择“启蒙理性”。

席勒的路径大体相同，年轻人热情冲动，很容易选择冲撞激烈的强力意志，狂飙突进之后，才会发觉问题原非自己的一腔热血可以解决。他的沉入康德哲学，埋首史料梳理，甚至试图发明美育思想，都是亲近理性的一种尝试。但他显然也同样意识到，仅仅是启蒙，恐怕并不能解决问题。